

近 20 年的中国 19 世纪俄国文学研究^{*}

杨明明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19 世纪俄国文学一直是我国俄苏文学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近 20 年来,其研究开始逐渐步入一个反思与沉淀时期,呈现出研究方法多元化、文化批评渐成主流、生态批评异军突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经久不衰、托尔斯泰等其他经典作家研究遇冷、比较研究逐步展开、诗歌研究不断深化等发展态势。

关键词 19 世纪俄国文学 文化批评 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

China's Study of 19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Recent 20 Years

Yang Mingming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always occupied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study of Russian and Soviet Union's literature in China. In the recent 20 years, this branch of study gradually entered a period of contemplation and subsidence, presenting a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iversified research methods, mainstream of cultural criticism, rise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continual craze over Dostoyevsky, neglect of research on Tolstoy and other classic writers, and abundant accomplishment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Keywords 19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Dostoyevsky; Tolstoy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涌入及我国学者研究理念的更新和学术视野的开阔,我国文学研究界对俄苏文学也“不再采取从前的亦步亦趋或者完全敌视的态度”,而是转而寻求“建立起一种理性的、平等的交流关系”^[1]^[25],从总体上看,我国的 19 世纪俄国文学研究正逐渐步入一个反思与沉淀时期,学界也益发表现出一种冷静务实、不急不躁的成熟稳健姿态。

一、文化批评渐成主流

建构综合化、多样化、整体化的俄苏文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既是时代文学研究理念变革的产物,又是我国学界对以往研究方法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除了社会历史、伦理道

德、审美等传统研究模式,20 世纪的文学研究经历了心理学、语言学与文化三次范式转向,这一切带来了文学研究方法的极大丰富。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起,这些研究方法先后被我国学者富于创造性地应用于 19 世纪俄国文学研究当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进入 90 年代,文化批评逐渐成为我国俄苏文学研究的主流。作为一种宏观的历时性科学研究方法,文化批评凭借其“视野的开放性、思维的多元性和方法学上的包容性”赋予了文学批评前所未有的活力,它“不仅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视野,改变了文学批评的路径,丰富了文学批评的可能性”,更是将文学“置于社会历史与人类生活方式——文化

^{*} 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60 年”(09&ZD071)

的变动之中,挖掘文学作品的文化精神特性,确认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从而“重新确立了文学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2][14]}使我们的审美注意力转向了文学背后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有助于揭示隐藏在作品和作家背后的宏观世界的图景。以往,我国的19世纪俄国文学研究中这方面的成果极少,自90年代中期后,才相继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问世,如任光宣的《俄国文学与宗教(基辅罗斯——19世纪俄国文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高莽的《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群言出版社,2000年)、金亚娜的《充盈与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与《期盼索菲亚——俄罗斯文学中的永恒女性崇拜哲学与文化探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朱建刚的《普罗米修斯的“堕落”——俄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谢春艳的《美拯救世界——俄罗斯文学中的圣徒式女性形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刘锬的《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等。上述专著或是全部或是以相当的篇幅对19世纪俄国文学与俄罗斯宗教及文化精神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独到而深入的解读和阐释。其中任光宣的《俄国文学与宗教(基辅罗斯——19世纪俄国文学)》是我国学者探讨俄国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论著中较早的一部,书中对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创作与宗教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金亚娜的《充盈与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和《期盼索菲亚——俄罗斯文学中的永恒女性崇拜哲学与文化探源》则是研究俄国文学与宗教关系的两部力作,前者从宗教文化的视角对果戈理、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的代表性著作进行了重新解读;后者则深入探讨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永恒女性”崇拜哲学及其文化渊源,并对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托尔斯泰等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独特审美观照。

进入21世纪,我国的19世纪俄国文学

研究益发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生态文学研究的异军突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态危机已成为全“人类关注的焦点”。在这一“全球语境下诞生的生态文学及其发展”越发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同样诞生于“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社会土壤”、饱含深厚“民族传统文化积淀”、富于“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3] (17)}的俄罗斯生态文学是较早关注人与世界这一文学永恒母题的。19世纪俄国文学作为俄罗斯生态文学产生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亦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杨素梅与闫吉青合著的《俄罗斯生态文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周湘鲁的《俄罗斯生态文学》(学林出版社,2009年)等专著不啻为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的有益尝试和宝贵探索。

二、作家研究著力不均

近20年来,并非所有的19世纪俄国作家都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只有那些符合这一时期中国“期待视野”的俄国作家才继续为学界所关注。“在20世纪的中俄文学关系中,无论影响范式或是接受模式,比较而言,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四位经典作家“最具代表性”。^{[4] (256)}但在这一时期,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经久不衰之外,托尔斯泰、契诃夫研究的上升势头都有所减弱,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研究更是呈现出趋冷的态势。

毋庸置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近20年来最受我国学者关注的俄国作家,而我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热潮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借了巴赫金席卷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东风。我国学界在研读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等著作的同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这位在我国命运多舛的俄国经典作家。时至今日,我国学者已先后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相关研究论文,出版专著十余部,这些成果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其中何云波的《陀思妥

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何怀宏的《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新华出版社,1999年)、赵桂莲的《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杨芳的《仰望天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专著在吸收了当代俄罗斯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作家与俄罗斯文化、东正教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阐释。季星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彭克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专著着力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的探讨。此外,李春林的《复调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陈建华的《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年)中的相关章节、田全金的《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著作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对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也更进了一步。

无论是从相关论著的数量上来看,还是从质量上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新时期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焦点作家与热点作家。我国学者虽然在其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研究视角雷同、方法单一等明显不足之处。从总体上讲,我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热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学者能够在立足于中国视角和全球视野的基础上,从历史、文化、宗教、美学、诗学等多个角度完成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掘进,从而最终彰显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创作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独特魅力。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枝独秀的局面相比,同一时期我国的托尔斯泰研究就显得相对弱势,虽然有邱运华的《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0年)、吴

泽霖的《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李明滨的《托尔斯泰及其创作》(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正荣的《托尔斯泰的体悟与托尔斯泰的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陈建华的《人生真谛的不倦探索者:列夫·托尔斯泰传》(重庆出版社,2007)、杨正先的《托尔斯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等力作问世,另外还有大量相关论文见诸报刊,但从这些成果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托尔斯泰的哲学、美学思想、小说诗学及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分析等方面。从总体上说,作为对20世纪的中国影响最为持久和深刻的俄国作家,我国学界对托尔斯泰博大精深的思想与文学遗产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展望未来,对托尔斯泰作品的多元化解读与阐释、东方哲学对其思想与创作的影响、其学术史研究、国外托尔斯泰学研究最新成果的介绍等必将成为我国托尔斯泰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契诃夫是另一位对中国影响较大的俄国作家,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的契诃夫研究虽然在数量上有所下降,但成果的学术水准却有所提升,特别是在其小说、戏剧和比较研究三个方面称得上是硕果累累。对契诃夫小说的研究,不仅有“关于创作总体的研究”,也有对于单部作品的解读与阐释及对小说“人物形象、语言、结构等的具体探讨”^{[5] (98)}等。契诃夫戏剧以其独有的“哲理性的寓意、象征性的暗示、散文式的结构、‘契诃夫式情调’和‘停顿手法’等”^{[6] (202)}特殊品格一直吸引着我国学界关注的目光,近二十年来我国发表的相关论著数以百计,其中具有总结性质的论文集和专著有王远泽在《戏剧革新家契诃夫》(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刘建中的《契诃夫小说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朱逸森的《契诃夫:人品·创作·艺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和《契诃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嘉宝的《现代文化视野中的契诃夫》(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李辰民的《走进契诃夫的文学世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刘

研的《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马卫红的《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契诃夫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进入21世纪,我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契诃夫研究热潮,与以往不同的是,随着有越来越多的文学方法论被引入到契诃夫研究当中,虽然也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技术分析至上”的倾向。纵观中国百余年的契诃夫研究史,对契诃夫的“再评价、再批评”“只有建立在扎实的接受史研究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此,今后的研究重点必然要放在对契诃夫作品的更加深入的分析与解读及作家所处的世纪之交的独特历史文化语境的研究上,而对其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及其“戏剧美学观念、审美视角和表现方式”之“独特性的研究”^{[7] (64-65)}也必将成为我国学者所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课题。

除了上述论著外,这一时期对19世纪俄国作家创作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还有程正民的《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胡日佳的《俄国文学与西方审美叙事模式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等,其中前者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对多位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个性及其艺术思维特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后者则从叙事美学的角度对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西方作家及作品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较研究。

三、诗歌研究不断深化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在19世纪俄国诗歌的研究上亦有所突破。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所撰写和发表的相关论著中既不乏对19世纪俄国诗歌的整体性研究,亦多有对诗人创作的颇富新意的个体性研究;而在诗人研究中,既有在普希金等我国传统研究领域中的创新力作,亦有在丘特切夫等“纯艺术派”诗人研究领域的开拓之作。在所有19世纪的俄国诗人当中,虽然学界和读者对普希金的热情有所减退,但他依然是研究成果

最为丰厚的一个。除了陈训明的《普希金抒情诗中的女性》(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查晓燕的《普希金——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文飞的《阅读普希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等著作外,还有张铁夫的普希金研究四部曲《普希金与中国》(岳麓书社,2000年)、《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和《普希金:经典的传播与阐释》(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问世,回顾了普希金的百年中国之旅,揭示了中国普希金研究的成就与困境,从多维视角对普希金的经典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填补了我国在普希金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

这一时期我国对其他19世纪俄国诗人的研究也有代表性成果问世,如魏荒弩的《论涅克拉索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顾蕴璞的《莱蒙托夫》(华夏出版社,2002年)、曾思艺的《丘特切夫诗歌美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丘特切夫诗歌美学》是我国第一部从哲学和美学高度对丘特切夫这位“纯艺术”派诗人的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专著,“作者运用美学、文艺心理学、比较诗学等方法,在阐述丘特切夫哲学和美学观的基础上,立足文本,从抒情艺术、结构艺术和语言艺术方面”对“其诗歌独特的艺术世界”进行了“具体阐释”,进而对“其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进行了深入的分析。^{[8] (223)}

四、19世纪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

19世纪俄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社会与文化影响之深刻是其它国家的文学所不能比拟的。世纪之交,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在走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之后,亟需对中俄文学关系进行系统回顾与深刻反思。在这一大背景下,益发突显出19世纪俄国作家在中国的影响范式与接受模式这一课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除了上文中论及的有关探讨俄国作家对中国文学影响问题的论著之外,尚有

多部探讨中俄文学关系的总结性著作问世,如智量的《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汪剑钊的《中俄文字之交:俄苏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漓江出版社,1999年)、汪介之的《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他与陈建华合著的《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赵明的《历史的文学与文学的历史——五四文学传统与俄罗斯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陈遐的《时代与心灵的契合——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前期创造社文学之关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陈国恩等的《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建华的《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年)与《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重庆出版社,2007年)这两部我国中俄文学关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前者系统梳理了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对中俄文学之间的译介过程、作家作品比较、风格流派和思潮交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自克雷洛夫起的多位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更是做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后者“作为一部国别文学史,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学者百年来研究俄苏文学的历史”,^{[9] (103)}这部四卷本洋洋百万言的巨著的出版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书中辟有专章对多位19世纪俄国作家在中国百年来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详实的论述。

近20年来,我国学者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为思想武器,大胆借鉴与引入各种新的文艺思潮和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多侧面的切入,广泛选题,深入探索,卓有建树,成就斐然。但是,回顾以往的研究历程,我们也必须看到,现有的研究成果与状况也远非尽善尽美,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憾有待完善。

第一,高质量的成果尚嫌不足,整体性研

究有所欠缺。相对于20世纪俄苏文学的研究,我国对19世纪俄国文学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从整体性研究来看,虽然已有数部文学通史问世,但是在断代史和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体裁类别史的编写方面仍是有所欠缺,对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这两种19世纪俄国最为重要的文学思潮更是缺乏系统梳理与深入思考。

第二,作家研究冷热不均,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当前我国19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上,欠缺整体性研究,对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纯艺术派”、“民粹派”的研究或是刚刚起步,或是远不够全面深入。即便是在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领域也还需要有更多的高质量成果的产出。

第三,走入方法论的误区,“话语独立性远远不够”。“当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惟西方文论马首是瞻,文学研究话语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10] (60)}当前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也已经逐渐认识到“跟着俄国人的调子走不一定好,照搬西方人的话语也未必能诠释明白俄苏文学。简单的拿来主义最后只能失去自己的话语”,^{[11] (143)}只有立足于“中国人的独特的文化视角”,才能最终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

第四,成果的创新性不够,文本分析能力有待加强。在我国现有的19世纪俄国文学研究成果中,固然不乏见解独到、论述有据的优秀之作,但也存在着不少水平不高、人云亦云、应景凑数之作。“究其原因,除了作者的文学素质和责任心不够等主观原因以外,缺乏对文本本身的深入分析和透视领悟是主要因素。”^{[12] (60)}

基于我国19世纪俄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传统、现实语境、审美习惯与价值取向,我国学者在新世纪的研究实践中应该力求遵循“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相结合”、“文化批评与

审美批评相结合”、“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建构起一种新的批评模式,行之有效地将我国 19 世纪俄国文学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同时,对 19 世纪俄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作为传统能产型课题,今后依然将是我国 19 世纪俄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仍需对其给予更多关注,就俄国经典作家、作品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一方面有助于提升我国学者在国际俄罗斯文学研究界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构建我国独特的俄苏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 19 世纪俄国文学研究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参考文献

- [1] 陈国恩、庄桂成、雍青: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2] 徐靖焱、王悦:浅谈文化批评对文学批评走向的影响//大众文艺[J]2008年第9期。
- [3] 闫吉青:俄罗斯生态文学之特质探蕴//俄罗斯文艺[J]2009年第4期。

[4] 赵明:历史的文学与文学的历史——五四文学传统与俄罗斯文学[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5] 侯晓艳:20世纪国内契诃夫小说译介及研究述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J]2009年第5期。

[6] 陈建华: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3卷[M]重庆出版社,2007。

[7] 杨凯:中国的契诃夫研究//重庆大学学报[J]2005年第6期。

[8] 张能泉:丘特切夫诗歌研究的新创之作——读曾思艺先生的《丘特切夫诗歌美学》//湖南科技学院学报[J]2010年第7期。

[9] 田全金:中国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评陈建华主编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中国比较文学[J]2008年第1期。

[10] 朱达秋:2001至2005年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J]2007年第2期。

[11] 李安:俄苏文学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方宝地——“俄苏文学研究”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J]2003年第3期。

[12] 朱达秋:2001至2005年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J]2007年第2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